



上海近代 佛教简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近代佛教简史

游有维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130千字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本

ISBN7—5617—0075—X/K.007

定价: 1.20元

前 言

上海佛教，自三国孙吴赤乌年代康僧会传教建寺塔以来，已有1770余年历史。上海佛塔的建造共有13座，唐宋两代造塔则有8座，这也反映了上海佛教在唐宋两代发展的历史见证。但从佛教全面发展来考察，则在辛亥革命以后，是为上海佛教全面大发展时期，而形成全国佛教复兴的中心，这就使上海在近代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余研究上海佛教史有年矣，原拟编写上海佛教史，为填补上海佛教史领域的空白，兹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编写《上海文化史小丛书》的筹划，约余编写《上海近代佛教简史》以相辅，事与愿符，欣然承诺。余以为编写《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必须从古代写起，因为现存古寺无几，而现存佛塔13座，其中12座均为古代建筑，如舍古不谈，不仅无以全知上海佛教史的发展过程，同时，无异于将千数百年来作为上海佛教历史见证的古寺古塔一笔勾销，则其失误非小，故从古谈起之管见，正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历史通例，详于近代。本书内容约十余万言，古代佛教，只占十分之二，近代佛教，则占十分之八，故内容仍以近代为主，略古而详于近代也。上海古代佛教，虽有志乘可考，但志乘详略不一，甚至载籍不全，无从查考，所以对上海古代佛教之兴衰情况，只能写其大概。近代佛教，除《同治县志》等可考外，全凭历年向多方搜集资料，编写而成。因此，遗漏之处，仍属难免，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1986年国庆节游有维写于上海，时年七十

第一章 三国时佛教开始传到上海

第一节 支谦初到东吴译经

印度佛教自东汉明帝十年(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国后,首先传布于北方,到了魏、吴、蜀三国时代,佛教才传播到江南的吴国。

吴国占据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南面的交州(原称交趾,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大部),也在它版图之内。孙权在东汉末年(公元220年),建都武昌,黄龙(孙权年号)元年(公元229年),改都建业(今南京)。东汉末年,北方洛阳一带大批难民为逃避战乱而迁居江南的吴地,其中佛教徒支谦,也在这时避乱到东吴。支谦不是僧侣,而是居士,他出生在东汉灵帝时归籍汉朝的月氏民族的家庭中,从小就学习汉文化,深通文学,后又兼学梵书。他曾从同族学者支亮(支谡弟子)学习大乘佛教理论,他不仅是个翻译家,并博览经籍,对世间艺术,多所综习,被人称为“智囊”。当时吴主孙权闻他博学有才慧,即召见之,拜为博士,命他辅导太子孙登。赤乌(孙权年号)四年(公元241年),孙登死后,他就去苏州穹窿山过着隐居生活,六十岁卒于山中。支谦自洛阳来到东吴,先在吴都武昌,从事佛经翻译工作,后吴国改都建业,他又到建业继续翻译佛经,据《出三藏记集》卷2记载,支谦从孙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到建兴(公元253—254年)年间,共译出《大明度无极

经》等36部48卷。支谦虽首先来到东吴翻译大乘佛经，为江南有大乘佛法之始，但他是个在家居士，没有在吴地建寺传教，所以他对吴地佛教的传播影响不大。《高僧传·康僧会传》说“吴地初染佛法，风化未全”，“佛教未行”等，正反映了这种情况（有人说，安世高于东汉灵帝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曾到江南弘传佛教小乘法）。

第二节 康僧会到东吴、上海传教建寺塔

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天竺僧人康僧会从交趾来到吴都建业以后，除译经外，并重视对一般民众的传教。他建立茅屋，设立佛像，进行传教活动。当时孙权召见他，诘问佛教有何灵验？会说：“如来迁迹，已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造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孙权以为怪诞，对他说：“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寺塔……”据说康僧会通过烧香祈祷，得到佛舍利十三颗，倾动一时，孙权遂为建寺和造十三座佛塔分供十三颗舍利。因吴地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并名其地为佛陀里。这是江南有佛教寺塔的开始。康僧会在建初寺译出《六度集经》、《道品经》等，又注释《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为注经弘法之始。同时并设像行道，由是江南佛法遂兴。据《康僧会传》记载：康僧会一直以建初寺为中心从事译经和传教，故康僧会历来被传为江南第一个传法建寺者。

上海的龙华寺和龙华塔，据《同治上海县志》说：“相传寺塔建于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又说：“古龙华塔在龙华寺前，赤乌西竺康僧会，精修祈请，得五色舍利，吴主权（孙权）命建塔表之。”龙华寺为江南著名古刹，康僧会为上海龙华寺

开山之祖。据清代康熙间上海张宸《龙华志》说，康僧会游历至上海龙华荡(今龙华镇)，见水天一色，藻荇交横，指曰：“此地尘辙不到，颇宜清修，于是鸠工车戽(即车水)，果得穴，为神龙窟宅，遂以法召龙王乞地。广泽龙王自知力不能抗，即许舍地，但告会曰：‘师有居，我无宅，奈何？’会曰：‘我必还汝那居，须为我护法’。”遂定基建寺，并在大殿东庑建外伽蓝堂，安广泽龙王为本寺伽蓝护法神。这是上海佛教传来建寺的开始。迨唐僖宗乾符中，寺遭兵毁，惟外伽蓝堂广泽龙王数椽，得与塔并峙。历代以来，外伽蓝堂屡经修建，犹秉康僧会遗教也。今外伽蓝堂虽不独立存在，但广泽龙王伽蓝护法神位还供在寺内前殿右鼓楼下，亦即今之所称外伽蓝堂。

上海的静安寺，传说也是建于三国孙吴赤乌年代，过去静安八景中有一景为“赤乌碑”，碑上有“赤乌”两字，可见静安寺建于三国赤乌年间，是有文献可证的，故静安寺与龙华寺同样是赤乌古刹。这些历史传说，反映上海佛教的开始出现，与康僧会的“传法建寺”是分不开的。

康僧会，祖先是康居国人，后来世居印度，他父亲因经商迁到交趾。十余岁时，父母双亡，至丧事毕，在交趾出家。因出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影响，据《高僧传》记载，康僧会“明练三藏(佛教三藏)，博览六典(儒家六经)”，对佛教经典和儒家典籍都很精通。他于吴赤乌十年到达建业，曾说服孙权为舍利建寺塔，说服凶暴的孙皓(孙权的孙子)，信奉佛教。这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进入宫廷弘扬佛教的僧侣之一。他弘扬佛教，开始和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公开提倡“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并借佛教的经典，讲儒家的道理，使人通过佛书，会通儒佛，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也是他在实现佛教中国化方面别树一帜。旧传支

谦来到东吴译经时，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洹梵呗一契。他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又据传说康僧会来到东吴传播佛教时，还带来印度佛教画本，当时画家曹不兴，即据以绘画佛像，成为名家。这对佛教的传播有深远影响。

第三节 上海赤乌古刹古塔 及近代宗派法师传

上面已略述上海佛教在三国孙吴赤乌年代开始出现，现再把上海赤乌古刹古塔及近代佛教宗派法师的历史简述于后。

一、龙华寺

龙华寺，在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2853号。寺的前面有龙华塔。

据《同治上海县志》：“相传寺塔建于吴赤乌十年，赐额龙华寺。”又说：“古龙华塔在龙华寺前。赤乌中，西竺康僧会精修祈请，得五色舍利，吴主权（孙权）命建塔表之。”

龙华寺为江南著名古刹，相传三国时康僧会为龙华寺开山之祖。

龙华寺自三国以来，历经兴废。《县志》称，在唐代武则天垂拱（公元685—688年）年间，增修大殿。唐末，因遭受战火，寺塔先后被毁，又鞠为茂草。

唐代皮日休《龙华夜泊》诗云：“今市犹存古刹名，草桥霜滑有人行。尚嫌残日清光少，不见波心塔影横”。在唐人诗中已称龙华为古刹，可以想见其历史悠久。“秋江塔影”是龙华

八景之一。

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上海一带属于东南吴越国，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巡行江浙，夜泊浦江之上，见草莽间祥光烛天，询其地为古龙华寺基地，遂命大盈庄务将张仁泰重建殿宇及宝塔。

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发帑重建大佛寺殿，并复新宝塔，于寺北隅建白莲殿，赐寺额曰“空相”。至今寺内花园里还留两块“空相寺西南界石”的物证。

龙华寺在宋代就成为天台宗祖庭，所以龙华寺称为龙华教寺(见《同治上海县志》卷31)。宋代宁宗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台宗尊宿鉴堂(是台宗第十七祖四明法智大师法裔)，曾在龙华寺重新开拓台宗祖庭。他敦修苦行，冬夏一裘一葛，囊无长物，惟以天台宗要旨开悟后学为己任。嘉定间，奉敕住持杭州上天竺寺，赐号圆明。他念龙华是他过去学习台教的道场(按：可见龙华当时已为台宗祖庭)，寺宇规模狭隘，于是重事扩充山门廊庑，晨钟暮鼓，克奉清规。世寿九十六岁，无疾而逝。其得法门徒净岳，学天台教，尽得其要，说法度生，缁白归向。尝取荆溪尊者(台宗第九祖)所著《金刚辨》，科分章段，弘扬台宗教义(见张宸《龙华寺志》)按鉴堂和净岳，都载于《佛祖统纪》天台宗诸师列传。现在藏经中有《科金刚辨》一卷，就是净岳科分的。所谓“科者断也，禾得斗而知其数，经得科而义自明。”

龙华寺至元代末年，又毁于兵燹。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时又重建，规模很大，时称“绀殿蕊宫，檐牙复道，近古土木所未有。”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又重修，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僧苔林又重建。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神宗奉肃太后命，派太监赐给龙华寺许多法物，包括明版

《大藏经》，范金毘卢佛像，金印等，并赐僧达果金环紫衣，护藏（即保护颁赐的《大藏经》），赐其徒理圆银环紫衣，护藏。其时，有所望创修大殿。后来又有陆镒复修。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重修宝塔。

上述明代万历二十六年肃太后赐给龙华寺明版《大藏经》、范金毘卢佛像、金印三种法物，旧称龙华寺三宝。明版《大藏经》，在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东征时被毁。范金毘卢佛像，约高七尺，莲花座四周配以千佛，“文革”时被毁。金印尚在，金印正文：“钦赐承恩堂龙华讲寺之宝印”，外圈刻有：“大明万历二十六年钦赐承恩堂龙华讲寺之宝印”。时龙华寺始建大方丈室，赐额承恩堂，系明神宗御笔。

清代顺治（公元1644—1661年）年间，禅宗韬明（临济宗第三十二世），住持龙华寺，复新寺宇，康熙间（公元1662—1722年），相继重修。韬明逝世后，葬于寺内左侧花园中，并建碑立塔。从韬明入主龙华来看，龙华寺又改为禅宗门庭。

龙华寺至近代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天台宗观竺（天台宗第四十祖）继主龙华法席，恢复台宗祖庭，弘扬天台教观。

至于龙华寺近代台宗祖庭的法派源流，这就要从天台宗第二十九祖天台山高明寺百松真觉法师说起。他传授法派有六十四字，开头四句，就是“真传正受，灵岳心宗，一乘顿观，印定古今。”百松法名真觉，是第一世；幽溪法名传灯，是第二世；藕益法名正旭，是第三世，为台宗第三十一祖。传至清代咸丰三年，观竺法名观义，是第十二世，为台宗第四十祖。观竺在龙华寺传法给所澄（法名印鉴），是第十三世，为台宗第四十一祖。同治九年（公元1807年），所澄在龙华寺建大悲阁，同治十三年（公元1871年），观竺请领《大藏经》，龙华台宗祖庭，由此复兴。所澄以后，分为五支法流：一空山，

二月溪，三文果，四迹端，五志拱。当时以奉化岳林寺文果和尚文最盛（见《海潮音》15卷3号《龙华寺住持问题》文）。龙华寺到了咸丰末年又为兵火所毁。至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经寺僧静再、文果等重新募建寺宇，构成了龙华寺现在的规模。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龙华寺晓柔法师讲《法华经》。次年，寺中大海法师讲《楞严经》。时谛闲法师才二十六、七岁，他正在平湖福臻寺从敏曦法师学天台教，听到龙华弘扬天台教观，也赶到龙华参加两次法会，并讲了偏座（见《谛闲大师年谱》），可见，当时龙华台教宗风之盛。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迹端法名定融，任龙华寺方丈（见《谛闲年谱》），他是所澄传法弟子，第十四世，为台宗第四十二祖。是时，谛闲二十八岁，他在龙华听大海法师讲《楞严经》后，就应杭州六通寺请讲《法华经》而回到天台国清寺闭关潜修。迹端很器重他，一再命他出关相助，任龙华寺库房职（又名知库，即副寺）。谛闲在寺，边工作，边听经。同年迹端就在龙华寺传法于谛闲，所以谛闲是台宗第四十三祖。法派是高明寺百松真觉第十五世，法名古虚。光绪十五年（公元1888年），谛闲在寺阅读藏经。次年，谛闲在寺开讲《法华经》，台教宗风一时称盛。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谛闲又辅助敏曦法师讲《四教仪集注》于龙华。据谛闲《四教仪集注》自序说：“我太祖敏公老人，演集注于龙华教堂，众集二千余指。”当时台教宗风之盛，益可概见。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谛闲住持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主席，是时，龙华寺内部酿成五房法派之争，谛闲仅挂名龙华寺住持而已。

辛亥（公元1911年）革命期间，县议会曾作出决定。拆毁龙华寺，经公民朱章力争，得以保全。

1913年，谛闲见到龙华台宗祖庭无法维持，因受宁波当

局之请，住持宁波观宗寺。

龙华寺自1912年以来，以文达为住持，传法于元照时，龙华台宗祖庭为之一蹶不振。元照，浙江宁海人，住持龙华寺时，贪污腐败，达于极点。1934年，元照无法维持下去，乃将龙华寺移送上海佛教会另派他人为住持。那时浙江台宗龙华法派僧众，反对元照将龙华寺擅行送给佛教会，乃召集龙华台宗各法派及台属各同乡代表（因龙华寺一向都是台州人当住持，遂形成龙华台州派）在上海圆通寺开会讨论，作出五项决议：“一、公推宝静法师为龙华寺住持。二、派代表成丰、灵岩、可兴等，向佛教会陈明一切。三、将龙华寺历代传法事实函达王一亭居士，以免误会。四、组织台宗僧界龙华寺办事处。五、聘请德望昭著之律师为顾问（见《海潮音》15卷3号《龙华寺住持问题》文）。这五项决议的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持龙华寺由台宗法派来当住持。当时上海佛教会及龙华台宗法派都曾去函并派代表到宁波观宗寺请宝静为龙华寺住持。宝静是谛闲的传法弟子。法名今德。宝静初认为龙华寺系台宗祖庭，义不容辞，并曾到龙华寺去看过，后宝静见该寺内部复杂，又不愿勉为其难，遂决意辞绝。

龙华台宗祖庭的住持问题，自经1934年一度纷争，结果经当时所谓护法居士段祺瑞、于右任、王一亭等公推性空老和尚为龙华寺住持。性空原为四川峨嵋山僧人，他住持龙华寺后，即募集巨款，修建殿宇房舍，为全寺佛像装金，并严整规律，恢复十方丛林制度。复于1935年、1936年、1947年传授千佛大戒，启建水陆道场，广结法缘，一时称盛。吴铁城、于右任均送匾额褒扬。

龙华寺三次传戒，第一次传戒的主要原因，性空住持龙华寺，因台宗祖庭的关系，于是嗣法台宗谛闲为其本师（见圆

英《龙华千佛戒序》)，因此于1935年在龙华发起开传 嗣 法本师谛闲八十寿戒。

按佛教寺院的住持传承方式，从宋代起，就有子孙和十方的两类。子孙制的寺院，是师徒剃度相承的世袭制，又称为子孙丛林或剃度丛林。十方制的寺院，是由官方或地方群众监督的选贤制，故又称为十方丛林。十方丛林中，依住持继承制度的不同，还有选贤丛林与传法丛林之分。如龙华寺住持制度，原为十方传法丛林，后来演变为五房法派成为子孙丛林的变种，故性空住持龙华寺，仍恢复为十方传法丛林。所谓“丛林”，意为众僧聚居寺院一处，有如众木相倚成林，故名丛林。

相传，寺塔初建时即以“龙华”为名。后人见《弥勒下生经》中有“龙华三会”之说，遂以龙华寺为弥勒菩萨的道场。五代时，浙江奉化岳林寺有布袋和尚者，名契此。传说他常背一布袋入市，见物即乞，时显神奇，临终作偈云：“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人遂以布袋和尚为弥勒化身。于是，龙华寺、布袋和尚、弥勒菩萨就结成一体了。布袋和尚于农历三月初三日圆寂，遂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日在龙华寺举行庙会，以资纪念。后来，本以宗教活动为主的庙会，又变成了城市百货商品和农村土特产的物资交流会。

龙华以牡丹驰名。寺内韬明禅师塔前八角形花坛里那株已有130多岁的“粉妆楼”，年令虽老，青春尚在。此花系清代咸丰（公元1851——1861年）年间，植于杭州七仙桥东林寺。解放初，永禅法师通过师侄灵征用船运来上海，栽于寺中。虽经“浩劫”，国色天香，依然不减当年。

龙华寺右侧为龙华公园。园址本来是龙华寺右山门一路

的地皮，后面还有圆通殿遗址。这一带原是龙华寺的西院，昔时有白莲禅院、西隐山房、吐松山房等胜迹，现在都没有了。近百年中，龙华曾以桃花著称于申江，近人竹枝词云：“龙华寺畔草萋萋，柳绕江村花映溪。十里桃林红不断，画船常滞画桥西。”现在龙华公园桃花仍然不少，虽无昔年的十里桃林，但也不亚于“玄都千树”。每年花开，云蒸霞蔚，车水马龙，龙华道上，成为一时胜会。

二、龙华塔

《涅槃经》说：“佛告阿难，佛般涅槃荼毘（火化）既讫（完毕），一切四众收取舍利（灵骨）置七宝瓶，当于拘尸那伽城内四衢道中起七宝塔，高十三层，上有相轮。”这段经文，是印度释迦牟尼佛临终时指示四众弟子起建佛塔、安放佛陀舍利的最后遗嘱，也是佛教造塔的起源。

梁代慧皎《高僧传》说：“康僧会，吴赤乌十年至建康（今南京），孙权令求舍利，既得之，权为造塔。此中国造塔始也。”清代张宸《龙华志》说：“中国东京（洛阳）之立十二寺，自汉永平（年号）迦叶摩腾（始）也。江南之建三大梵刹（佛寺），十三宰堵波（此译为塔），自吴赤乌康僧会始也。”可见中国建寺是始于后汉的摩腾，造塔是始于三国东吴赤乌年代的康僧会。康僧会于吴赤乌十年在江南的上海创建龙华塔，就是他当时创建十三座佛塔之一。所以上海的龙华塔从它出生的历史来说，不仅是江南上海的古塔，同时也是中国最古的古塔。

龙华塔，在上海市徐汇区龙华寺前，巍峨壮美。原赤乌古塔，因唐末黄巢战火被毁，现在的龙华塔，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重建的。当时上海一带是属于东南吴越国，吴越国王巡行江浙，夜泊浦江，见草莽间祥

光烛天，询其地为龙华塔寺基地。遂命大盈庄务将张仁泰重建寺宇和宝塔。所以现存龙华塔的形式与结构，都是宋式。

龙华塔，八角形，七层，高达40.64米。楼阁式砖木结构，以砖身为主体，还是宋代原物。内部的砖室则为方形，每层方向依次转换45度，使壁体重量均衡，各层的高度也逐渐减少，整个的结构，处处都有科学根据。木结构部分，各层有楼板、扶梯，从第二层起，外有腰檐、平座、栏干，重重飞檐高翘，具有我国传统楼阁建筑之美。七层八角共悬着56只古铜的占风铃（又名风铎，遇风即响），风来时清脆的铃声，使人悦耳神怡。

在塔顶层上，树立一根铁制的塔刹，高8.25米。塔刹是由铜铁制的18件构成，覆在塔顶上的名“覆钵”，上面仰着的名“露盘”，状似铁圈的名“相轮”，共有七重，上面还有葫芦形的名“宝瓶”，及七级香炉等。这18件沉重的塔刹怎样安装到塔顶上？原来在塔的第六层砖室中央，竖立着一根18米长的塔心木柱，穿出塔顶，套上塔刹，不仅使塔的造型更加美观，还起着稳固塔的顶层作用。在刹尖还拖下四根铁索，系着屋面四个翘角，叫做“浪风索”。

昔人称赞龙华塔“规制秀丽，诸方所无，有评者谓其工巧得中。”当年登上这座塔，可以饱览黄浦江风帆，江村阡陌，极为寥廓。昔人登塔诗云：“登塔遥瞻极浦东，往来舟逐一帆风，饶他多见江村景，近水楼台此不同。”

龙华塔，经过1954年和1984年两次整修，完全恢复了宋塔面貌。特别是1984年对经历157年（道光七年最后一次修理）的塔顶层和塔刹重新大修理，新铸了塔刹的18件，更换了虫蛀的塔心木柱，出现崭新的巍然刹竿高耸，飞檐重重，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使龙华的风光，更为动人。

佛塔的形式很多，平面以正方形和八角形的居多，也有六角和十二角的。初期的佛塔，多是木料结构，因为塔身过高，容易诱导雷电和发生火灾，所以木塔的寿命较短，后来多用砖造。佛塔是我国古代人民宗教信仰的标志，同时也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创造的结晶。佛塔不仅是具有历史、文物价值，为研究我国建筑史最可靠的依据，还有点缀风景、壮丽江山的特色，颇受中外人士的瞻仰和欣赏。

三、近代天台宗谛闲法师传

谛闲(公元1858—1932年)，法名古虚，号卓三。俗姓朱，浙江黄岩人。父度润，母王氏，皆早逝。尝从舅氏学医，一日问舅氏：药能医病，不能医命，吾将求医命之法，舅氏不能答。于是有出家志愿。二十二岁，从临海白云山成道和尚出家。二十四岁，受具足戒于天台国清寺。初学禅观，颇有悟入。后从平湖福臻寺敏曦和尚学天台教义。

1884年，上海龙华寺晓柔法师讲《法华经》，次年，寺中大海法师讲《楞严经》，是时谛闲才二十六、七岁，听到龙华台宗祖庭宏扬天台教观，也从平湖赶到龙华参加两次讲经法会，并讲了偏座(即小座覆讲)，这是他在龙华学教的情况(见《谛闲年谱》)。可以想见当时龙华台教宗风之盛。

1886年，迹端(法名定融)任龙华寺方丈(见《谛闲年谱》)，他是龙华所澄的传法弟子(为台宗第四十二祖，法派是高明寺百松真觉第十四世)，谛闲时年二十八岁，他在龙华听大海法师讲《楞严经》后，就应杭州六通寺请讲《法华经》而回到天台国清寺闭关潜修。迹端很器重他，一再命他出关相助，任龙华寺副寺。谛闲在寺，一面工作，一面听经，同年，迹端就在龙华寺传法于谛闲，所以谛闲是台宗四十三祖，法派是

高明寺百松真觉第十五世，法名古虚。1888年，谛闲三十岁，在寺阅读藏经。次年，谛闲在寺开讲《法华经》。1893年，谛闲又应龙华寺请，由慈溪圣果寺出关至龙华寺讲《楞严经》。1894年，谛闲在龙华又辅助敏曦法师讲《四教仪集注》。据谛闲《四教仪集注》自序说：“我太祖敏公老人演集注于龙华教堂，众集二千余指。”当时台教宗风之盛，益可概见。1907年，谛闲又在龙华寺讲《楞严经》。1910年，他住持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主席，时龙华内部酿成五房法派之争，谛闲仅挂名龙华寺主席而已。是年，谛闲和月霞在南京三圣殿举办江苏僧师范学堂，担任监督，招青年僧徒，分班讲授，解行并进，会革命军兴中止。

1913年，上海留云寺（即海潮寺），创办佛学研究社，请谛闲主讲，首讲《八识规矩颂》及《圆觉经》等，是时谛闲住在留云寺。同年冬，谛闲见到龙华台宗祖庭无法维持，因受宁波当局之请，住持宁波观宗寺，寺为宋代台宗十七祖四明法智大师所建延庆寺的旧址。谛闲志在恢复台宗祖庭，遵四明大师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观宗讲寺。募建大殿天王殿及念佛堂、禅堂、藏经阁，规模焕然，蔚为东南名刹。

1915年11月，袁世凯借日人有要求来华布教之条约，指示他的同党孙毓筠等在北京发起“讲经法会”，请月霞、谛闲讲经。是时听众除了所谓名公、巨卿、各国公使外，还有都城四众等。后月霞讲《楞严经》至第七处征心时，得知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即毅然托病南旋。而谛闲留京讲经，袁世凯赠给他“宏阐南宗”匾额，命大儿子袁克定拜他做师父，并授意谛闲在广大听众方面进行促进帝制宣传，据《谛闲大师年谱》说：“筹备帝制，举国风靡，师具慧眼，但云僧人唯知奉持佛法，不知有君主民主，超然象外，迄未尝以当局眷注之隆，一言

劝进。足证师之定慧宏深，非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者，所能望其项背也。”

谛闲以振兴佛法、造就人材为职志，1919年又在观宗讲寺成立观宗学舍，自任主讲，罗致学僧，授以台宗大小诸部，由是人材蔚起，法徒分座四方者，不下数十人，后改并为弘法研究社，并发行《弘法月刊》，观宗讲寺遂成为近代天台宗的唯一道场。

谛闲一生宏扬天台教观，讲经四十余年，法席遍于南北，且远至哈尔滨，归依弟子至十余万人，可谓盛矣。

然而数典不能忘祖。上海龙华寺祖庭，同宁波观宗寺台宗祖庭，从宋代和近代的台宗法派的历史发展来说，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近代台宗的中兴，虽由谛闲住持观宗讲寺，宏扬天台教观、培植弘法僧材所致，但从谛闲一生来看（详见《谛闲年谱》），他同上海台宗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从二十七岁到五十五岁的前一阶段（公元1884—1921年），在上海龙华寺从学教、受记，以至弘法讲经，这都是他同上海龙华祖庭的密切关系。他从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的最后一个阶段（公元1922—1931年），几乎每年都在上海净土庵（宝山路）、圆通寺（周家嘴路）、玉佛寺、净业社、居士林等处，轮流讲经，宏扬天台教观，这是他晚年在上海致力宏扬台宗的最盛时期。因此上海近代台宗的兴起，同谛闲先后在上海的大力宏扬是分不开的。

谛闲于1932年在宁波观宗寺圆寂，享年七十四岁，塔于慈溪五磊山。他一生的遗著，1951年由嗣法门人倓虚及居士弟子叶恭绰、蒋维乔在香港华南佛学院结集为《谛闲大师遗集》共13种，分订10册刊行。